

中国古代官学校园选址研究

冯 刚 苗 严*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天津 300072

摘要: 本文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官学(庙学)校园选址的基本特点及影响因素。论文以文献研究为依据, 通过案例分析总结古代官学选址中风水形势、因旧更新、规避灾害等种种影响因素, 揭示古人在校园选址中的考量、思考、与变通。

关键词: 选址; 官学; 中国古代; 校园

一、前言

表1 四类影响因素典型案例列举

影响因素	代表性案例
风水形势, 与自然山水对话	广东信宜学宫、广东番禺学宫、广东罗定学宫、广西灌阳文庙、海南崖城文庙、海南澄迈文庙、重庆开州文庙、重庆璧山文庙、重庆奉节文庙、四川富顺文庙、四川通江文庙、四川乐山文庙、四川广元昭化文庙、四川安岳文庙、四川都江堰文庙、四川仪陇文庙、四川长宁双河文庙、四川雅安名山文庙、四川丹棱文庙、贵州黄平文庙、贵州关岭永宁州文庙、贵州福泉平越文庙、陕西西安临潼文庙、陕西合阳文庙、陕西华阴文庙、甘肃永昌县文庙、江苏泗阳县文庙、浙江嘉兴秀水文庙、安徽芜湖夫子庙、福建尤溪文庙、江西丰城文庙、湖北大冶文庙
因旧更新, 节材省力	浙江松阳文庙、浙江天台文庙、安徽蒙城文庙、安徽绩溪文庙、安徽泗县文庙、安徽歙县文庙、安徽巢城夫子庙、福建建瓯文庙、福建泉州府文庙、福建汀州文庙、福建惠安县文庙、福建上杭文庙、福建沙县文庙、山东巨野文庙、山东阳谷文庙、河南密县文庙、河南漯河郾城文庙、河南获嘉文庙、河南汝州县学宫、河南辉县文庙、河南南乐文庙、河南禹州文庙、海南澄迈文庙、海南文昌文庙、河北定州文庙、河北平乡县文庙、山西阳城县文庙、辽宁辽阳文庙、江苏江浦文庙、江苏六合文庙、江苏盱眙县文庙、江苏武进阳湖县文庙、江苏泗阳县夫子庙、江西潘阳饶州府文庙、湖北大冶文庙、湖北浠水文庙、湖北竹山文庙、湖南岳阳文庙、湖南湘阴文庙、湖南安化文庙、湖南安化文庙、湖南醴陵文庙、广东五华长乐文庙、广东潮州海阳学宫、广东丰城东海文庙、广西玉林文庙、广西灵川文庙、广西岑溪文庙、四川射洪金华文庙、甘肃镇原文庙
多在城内, 东为上, 南为尊	数量庞大, 范例见本文详述
规避科第不佳、闹市扰学、水患圯学、用地湫隘等问题	河北行唐县文庙、江苏六合文庙、江苏邳州府学、安徽萧县文庙、安徽繁昌夫子庙、福建漳州文庙、福建屏南双溪文庙、福建闽清县文庙、福建沙县文庙、四川乐山文庙、甘肃灵台文庙、河北香河县文庙、浙江海宁盐官孔庙学宫、浙江桐乡崇德文庙、福建长汀县文庙、浙江惠安县文庙、河南南乐文庙、湖南石门文庙、湖南宁远文庙、广州增城学宫、广州从化学宫、广东阳江学宫、广东罗定学宫、广西柳州学宫、海南海口琼山文庙、重庆丰都文庙、四川中江文庙、四川雅安名山文庙、四川武胜文庙、陕西合阳文庙、山西米脂文庙、甘肃静宁文庙、甘肃西和文庙

中国古代学校可以分为“官学”和“私学”。官学可分中央、地方两级。中央官学由中央直接创办和管辖, 如国子学; 地方官学则由地方官吏在其治所设置与管理, 如府学、县学、卫学等。古代学校存在形式很多, 如古史所记载的“成均”“庠”“序”“校”“瞽宗”, 周王朝都城的大学“辟雍”, 秦代的官学“学室”等。汉武帝时期, 已经开始自上而下重视地方官学, 开始把地方官学纳入各级行政体系当中。自汉代起, 逐步确立了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 对于儒学的创始人孔子的尊崇也不断提升, 并逐渐开始设置专庙以祭祀。由于儒学是各级官学教授的核心内容, 需要进行释奠、乡饮等祭孔活动, 因而逐渐有了“即庙立学”或“即学立庙”, 将学宫与孔庙并置的校园规划

*通讯作者: 苗严, 1993年10月, 男, 汉族, 山西朔州人, 就读于天津大学建筑学院, 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中国古代大学校园规划和建筑设计。

基金项目: 本论文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51478293)资助。

方法,亦逐步形成了中国古代官学设计最具代表性的“庙学”制度。“庙学”制度的典型特征为校园由以大成殿为核心的“庙”(孔庙)与以明伦堂为核心的“学”(学宫)构成,是精神与物质的统一体。“庙”,主要以祭孔及其相关祭祀为主要活动内容,“学”则负担主要的教学功能。

“庙学”制度萌芽于两汉至南北朝时期;隋唐至宋朝时期逐步走向成熟;元明以后走向兴盛,形成稳定的设计规制;清代进一步深入发展,并随着清末封建制度的解体而终结。它反映了古代教育思想、人文精神、规划理念等诸多方面的思想内核,其规划选址亦反映出不同时代文化背景下,中国人对于城市规划的认识与教育建筑群体选址的理念和精神。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古代官学校园设计选址,并没有过于机械地讲究。尤其是地方城市建设中,并不一定遵循“文东武西”的建筑配置,体现出一定的随意性。很多情况下,既有可用基地和既有“庙”或者“学”就决定了校园的选址。由于元代以后庙学发展趋于稳定和成熟,明代各级地方志出现,很好地保留了一些关于庙学选址的信息,让我们可以一窥古人的校园选址精神。基于590例个案分析可以看到总结得到,古代官学校园设计的选址主要出于以下几方面因素:风水因素,强调与自然山水景观的联系;因旧换新,主要是充分利用旧有基地而建庙学;大多择址城内,东多为上,南向为尊;远离不利因素,减少外界干扰等,其典型案例见表1。古代庙学的营建,并非一蹴而就,是随着年代逐渐演化发展的,免不了有多次迁址的情形,多次迁址的原因也不尽相同,往往是多种原因混杂在一起的复杂过程。同时,庙学迁址的原因多为用地湫隘卑劣,不能满足扩建和增建的需求;或是经常遭遇水患;亦或是因为靠近淫祠^①或者闹市区,对校园内的学生造成干扰;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因本地人才不多而归咎的“风水不利”或“方位不利”。

二、庙学选址

(一) 风水形势,与自然山水对话

风水,或称堪舆,是中国古人基于自身文化形成的一类自然哲学,而非简单迷信。建筑风水理论包含建筑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规划设计思想,是古人认识与处理自然与建筑关系的规划思想方法的一种综合与提炼。美国风水学博士尹弘基在《自然科学史研究》1989年第1期撰文说:“风水是为找寻建筑物吉祥地点的景观评价系统,它是中国古代地理选址布局的艺术,不能按照西方概念将它简单称为迷信或科学”^[1]。古建筑学家潘谷西教授在《风水探源》一书的序言中指出:“风水的核心内容是人们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的一种学问,其范围包含住宅、宫室、寺观、陵墓、村落、城市诸方面。其中涉及陵墓的称阴宅,涉及住宅方面的称为阳宅”^[2]。建筑风水理论研究的知名专家王其亨教授在《风水理论研究》中提到:“风水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在对建筑环境的选址规划中,还极为重视自然景观的审美,讲究建筑人文美与环境自然美能达到和谐有机的统一(图1),在理论和实践方面,表现出很强的美学性质,显示出中国传统文化的鲜明特色”^[3]。这些论述,概括出建筑风水理论对于科学认识我国古代建筑群体规划与建筑设计的重要价值。



图1 城市选址风水形势

以建筑风水为主要依据亦是官学选址常见的做法。信奉风水之说,由堪舆家择地建校,校园空间环境与自然和谐。校园“依山林、择圣地”,与自然山水相结合,远离城市的喧嚣,为学生营造了“鸟鸣山更幽”的清肃环境,有利于学生学习、修身。这种重视教育,重视学校建设的做法,也促进了社会崇尚文风的氛围。风水虽然有一定程度的

^①淫祠:淫祠意为不合礼义、不符礼制而滥建的祠庙。

迷信色彩，认为人才多是因为风水好是不够科学的，但它是中国人认识自然的一种特定的思维方式，是社会文化诸多方面特征的一种外在映射。以此为媒介，可以使公众更加容易认可庙学选址的决策，影响学风、文风，进而带动当地的社会风气，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

广西灌阳县“庙学”发展历史上，有依据风水选址的明确记载。灌阳县学，隋大业十三年建于县城东部，此时根据《宋嘉定十六年重修学门》的记载已经建有夫子庙。北宋徽宗崇宁间（1102—1106年），因用地湫隘，迁于县城西门外离城一里许，建有大成殿。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司教进士范昂将其迁回县治东部。后因县治东的学校无孔庙，县令与范昂合计将西门外庙学内的大成殿迁址至县治东的学校并进行重修，“重饬圣像，绘群弟子于壁间，黻裳元衣，秉圭端冕，乃左乃右，若趋若揖，灿然可观”^[4]。南宋淳熙九年，县令赵永以崇宁时期旧址“厥土爽塏，襟袍环密”^[4]，遂又迁回县城西旧址。

宋嘉定十六年有一篇记文对于淳熙九年迁建县西的文庙风水格局进行了这样的描述：“其山来自八桂，号曰台山，面古钟源，源上群峰森列，参错秀整，左曰华山，有舜庙，前曰灊江，江有禹祠，又其前曰笏山，西曰王楼山，有望华岩，有古城岗，西向洮水水流揖学，前有亭曰雩亭，环亭皆江也，洪涛沃日，澄澜际天，盖其亭登览之胜，士夫经从每叹赏云。”^[4]我们可以从图（图2/3）中看到其风水格局：背有龙脉台山、主山，前有朝山古钟源群，朝山左曰华山，山上有舜庙，中有案山笏山，灊江从前环绕而过，西有王楼山环抱。整体格局与王其亨先生《风水理论研究》中的最佳城址选择（图1）颇有一番相似之处。此后，明嘉靖二年，认为建于荒僻卑隘的城外不妥，仍迁回县城东原址。乾隆四十八年则再迁于西门故址。风水形势与实用功能两个校园选址基本因素权衡中此消彼长，不断左右校园选址的决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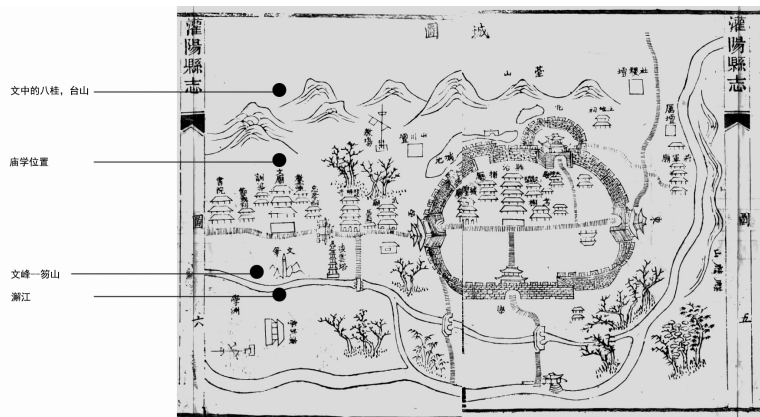


图2 灌阳县县城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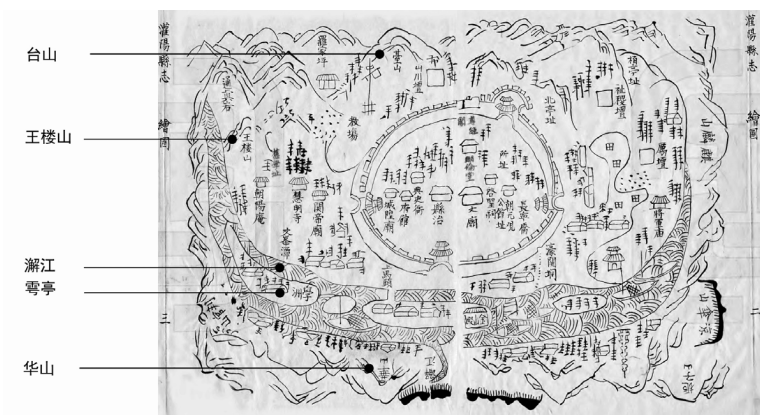


图3 灌阳县县城图

又如四川名山区文庙^②，于明洪武三年，由知县杨矩建于月华山麓，庙附于学。至清代道光二十一年移建于月华山顶旧时唐宋文庙遗址（期间曾为罗汉寺）建立“庙学”。知县王宝华移建文庙的时候，就充分考虑了“庙学”的风水格局（图4）：“相阴阳，度基址于县治北月心山废寺基处，得吉壤焉，其地后控蒙顶，前瞰衣江，登高眺望水

^②文庙：很多情况下并非单指孔庙，它常常是庙与学的统一体。

秀山明，实爽塏之胜域，为神灵之奥区”^[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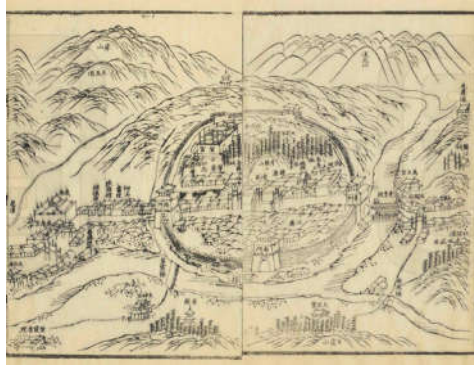


图4 名山县城图

嘉定府（现四川乐山市）文庙的选址同样以风水为重要依据。据县志中江朝宗的《嘉定州重修庙学碑记》中对于文庙风水格局作这样的描述：“嘉州，蜀之文献巨邦也，州之学宫据万景山麓，去州治西百步许，三峩峙其右，九顶列其左，雅锦二江滢洄环合于前，实州之形胜也，士之游歌其间者彬彬济济出^[6]。”（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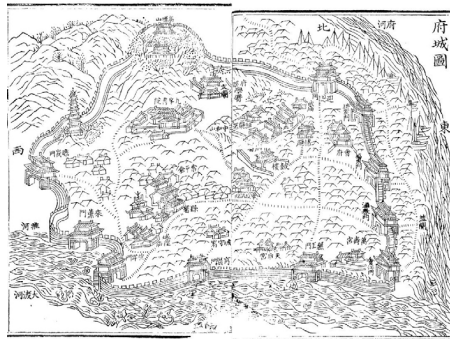


图5 嘉定府城图

宋宣和五年，福建安溪县令杨幹将县庙学迁址至风水宝地。从总图（图6）与县志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安溪庙学的具体格局为：背山面水，左右翼山环抱。后踞凤山，前俯龙津（指龙池，这里隐喻学校前的河），三峰外面，爽塏端拱^[7]。此外还有，四川广元昭化县文庙，“其建庙之地面眺白水，背依翼山”^[8]。凤山庙学，“康熙二十三年始建焉，在兴隆庄，前有莲池潭，为天然洋池；潭水澄清，荷香数里。凤山对峙，案如列榜，打鼓（山名）半屏（山名）插于左右，龟山、蛇山旋绕拥护，真人文胜地，形家以为甲于四学”^[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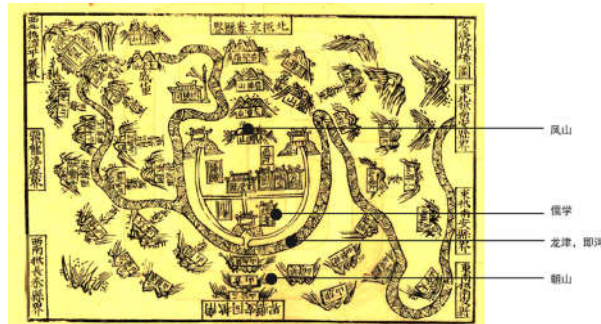


图6 安溪县境图

通过上述案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古代学校（庙学）选址所蕴含的风水形势层面的考量。校园风水格局与城市选址类似，常采用“背山面水”的风水格局，有条件的还会考虑朝山、案山、砂山等因素。从文献整理分析的结果来看，风水是庙学选址的重要因素，但并非全部，有时也并非主导因素。选址对风水因素考虑的程度与“庙学”所处城市、地理位置有着密切的关系，毕竟并非古代每个城市都能做到处于风水绝佳的位置；更重要的是与当地行政官员、堪舆家的责任意识、学识水平和用心程度等紧密相关的。至于有个别因风水而反复迁址的“闹剧”，如“嘉靖五

年知县龍宣和以形家言迁永泰县庙学，于东皋山之麓”；“万历二年知县陈克侯亦以形家言复迁还旧址”^[10]，则说明了风水之说的局限性。从当代规划与环境理论的视角来看，“庙学”风水格局的确在择址优势（近水又防水患）、视线联系、营造氛围、陶冶情操方面有其客观的优势。但真正谈到风水环境在整肃学风、振奋士气，使学校培养更多优秀人才方面，起到的作用还是局限的，肤浅的。

（二）因旧更新，节材省力

由于朝代更替、战乱、各类灾害及木结构本身体系之弊端等多种因素作用，庙学建筑常遭罹难或渐渐凋敝。且由于实际情形多受到财力、物力之限，故有部分庙学并非大兴土木，完整铺开重建，而是采用因旧更新的策略。从更新的程度，因旧更新可以分为部分因旧与全部因旧。从因借的主体来看，有的是因借旧庙学原址建设新的庙学，如前文提到的广西灌阳县学；有的则是因借旧的寺庙、宫殿、廨署建设新庙学，这与寺庙、宫殿和大成殿、明伦堂两主殿在结构和外观上有着高度的相似性相关。

江苏苏州长洲县学，文献记载有三次因旧地建庙学的记录。“县初未有学，附于府。南宋景定三年（1262年）制诏天下县新设主学，时宋楚材以选至，叹曰：官以主学名，而居无廬士，无稟师倚席不讲，可乎？遂请于太守陈均即广化寺改建学校，建讲堂曰礼堂，建四斋曰富文、贵德、广业、博学，又仰慕范文正公，因此建景文堂，建友德堂，绘学中士登大魁者黄由、阮登炳像于堂中墙壁，立学从此始；元初，以县之驿舍为孔子庙，大德六年（1302南）县迁徙到丽郡，移驿材在县故址建学校；正德二十年，教谕萧文佐以地隘不称，与巡按御史舒汀、知府迁城东之福宁寺，新建庙学”^[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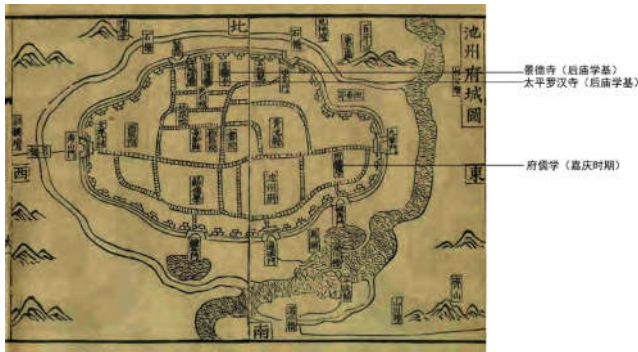


图7 池州府城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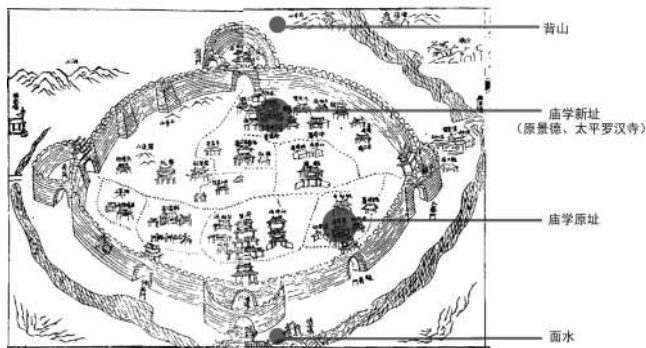


图8 池州府城图

安徽池州府学，同时综合考虑了迁建避免水患和庙学风水两方面因素。旧府学学宫初建于城东南隅。北宋太祖开宝癸酉年（973年），知府成昂移建于城西北。北宋仁宗至和甲午（1054年）知府吴中复仍移建于城东南，此后经历了多次的重修，于元末毁于战乱。明洪武三年至嘉靖十一年经多次修缮，逐渐形成完整的庙学格局。但是由于学宫“地卑湿，夏涝时至，江涨迫棹星门下，数月不降，则有事学宫者屡沮洳^③中修习，展礼所不便”^[12]，并且堪輿家说“形势无所据”。明隆庆元年，知府尹士龙将其从毓秀门移建到新址。该校址为宋景德、太平两座禅寺（太平寺，考

^③注：在这里的意思是湿。晋代左思《魏都赋》：“隰壤瀝漏而沮洳，林藪石留而芜秽”；《新唐书·韩全义传》：“遇贼广利城，方暑，地沮洳，士皆病疴”；清代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光绪十七年二月初四日》：“昔城中沮洳之地颇多积水，自营此沟，而民不苦卑溼，秽气亦有所滌，始少疾病。”

察嘉靖版本府志即太平罗汉寺，在景德寺西，图7)的旧址，后经万历、天启直到清代均有修缮与增建，庙学未曾再迁址。该府学迁址到二禅寺的原因是因为其地“依山面流，形与胜合”(图8)。《明徐绅池州府迁建庙学碑记》中赞叹道：“若夫撤其旧而特新之不安，于卑隘湫陋之常而必择夫高明光大之区以更置之，此其用心之贤何如也”^[13]。

安徽芜湖县庙学，在历史上也经过多次迁址，且文献中有在他庙建庙学和复因旧庙学建新学的记载。县学为宋元符三年建，在县东南一里许，南面辟城垣，城垣出曰金马门，直迎山川，东南俱城墙，西面以察院为界，北抵宣春门长衙(图9)。自崇宁元年至嘉靖三十三年均有增修的记载。万历十二年，城墙东缩，于是学官距离城墙过近，格局变得湫隘起来，于是迁建到城隍庙与察院旧址。万历十九年，知县听从儒士的请求，上报郡守，仍迁回旧地。万历四十四年，“应天府推周于蕃义奉委至谒庙，顾学址面逼于城，自定方属，知县魏士前辟金马门”^[14]，格局才有所宽敞，明后期、清代多次增建补修，庙学格局逐渐完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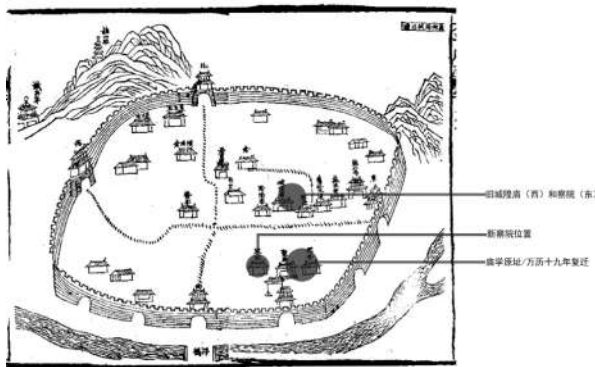


图9 芜湖县城图

安徽蒙城县庙学也有在原文庙旧基新建文庙的记载。县学之始建年代无从考证，元至元二十一年，县令李仲卿因旧庙基建设新庙。元贞年间，县尹刘正平改建到新的用地(记文^④显示新建位置在庙之东偏)。安徽太和县庙学，有“在县治东南，元大德间路花赤李英创建，后毁于兵。明洪武五年知县马良沿旧址重建”^[15]的记载。其他的案例还有福建龙海镇海卫儒学，最初是因佛寺草创；江西饶州府学，旧县治东有文翁宅，疑为汉学宫遗址，清代顺治时期，知府将淮王废址改建府学^[16]等。可见，因各类旧址建设新庙，是庙学选址的主要方式之一。

(三) 多在城内，东为上位，南向为尊

古代庙学营建，在选址的方位上也是很讲究的。在考虑风水形势的基础上，庙学方位设计常见的特点有以下几种情况：

1. 选址多在城内，个别特殊情况下选址于城外。
2. 是选址会尽量避免放置在西侧。
3. 庙学的朝向多以南向为尊，个别情况下，因为设计的局限，也会有其他朝向。

庙学绝大多数都选址于城内。广西富川县庙学属于初在城外，后移到城内的情况。富川县庙学明洪武二十九年建成，在城外西南郊。成化四年、弘治二年在原址重修。正德元年，因“南郊湫隘尘器，弗利多土藏修”，督学姚模徙建城内北隅，“称得形胜”^[17]。选址于城外的，常因为城外有绝佳的风水“吉地”，风水形势因素占据了主导地位，如前文提到的灌阳庙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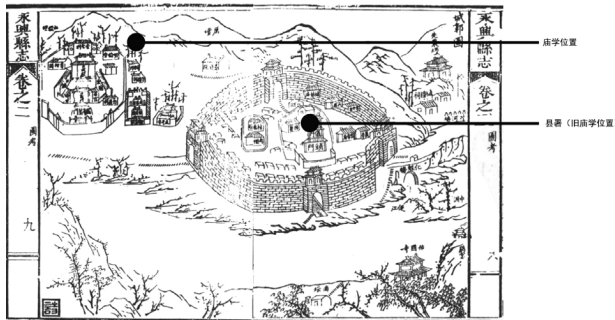


图10 永兴县城图

^④资料主要参考：汪麓，(民国)重修蒙城县城书[M]。台湾，成文出版社，卷之五学校，卷之十一艺文。

湖南永兴县庙学建于城外。宋绍定戊子，县令赵汝炳将庙学从县衙迁址到西关外重建（见图10），坐壬向丙（即坐北向南）。明、清多次增修。清顺治圯毁，康熙丙申年重修。乾隆二十七年，知县沈维基以学自改寅山申向，科第渐歇，改建艮山坤向，两次改向均处于坐东北朝西南向，后直到咸丰、光绪陆续有所增建^⑤。

庙学放于城东的位置是较常见的做法。福建沙县县学约建于唐武德七年。宋庆历元年，杜京到任拜谒孔庙时谈到“先师之庙，上自庠序，自郡县无不见之于东之位，此独不然，乃在县治之西。诚非其所博雅均值，将有间焉”^[18]。于是在庆历二年，徙于魁星坊，距离县治东半舍许，庙学斋舍等形制都很完备。由此记文可见，庙学选址于城的东侧是很普遍的做法。

考证全国现存文庙选址，大都是符合面南的特点。这里谈到的面南向并非严格坐子向午，常因地势、县城方位等不可抗因素稍有偏差。缪思齐、宋坤《中国古代城市与建筑方位尊卑观探源及演变》一文中认为，西汉时期已由东为尊开始转变为以南为尊，唐都城“更加系统、规矩地体现了‘面南为尊’的观念……宋代以后，直至清朝，随着封建社会的延续和封建礼教的强化，南北轴线最终完全击败东西轴线，成为了城市规划、建筑群落的主宰。”^[19]庙学格局从宋初定到元代成型与“以南为尊”的历史时期相重合，多为南向，南向也被这段时期的古人认为“合礼”的方位。即使有个别案例不朝向南向，也是由于风水形势、地形限制、旧有基地格局等因素所限制。如福建德化县县学，“宋时，在县治之东，后迁于县东南隅沙坂，坐巽向乾，议者谓弗称南面之义”。坐巽向乾，大致方位是坐东南，面向西北方位。于是，建炎中（1127—1130年）迁建于县治东，面朝南向，之后明清均有增建^⑥。广东吴川庙学，原在旧县治左，南向。自元至雍正时期，一直保持了这一格局。雍正五年，训导许绍中率绅士议请台使在分司废址处改建今所，一切都按照原来的建筑布局，改为面向西，庙学方向于是改为向西。（见图11，图12），从上述记载可知，吴川庙学之所以呈西向布置是因为原分司废址向西，直接借用原有建筑建学的缘故。创建于宋建炎年间的灵川庙学，康熙五十年，知县以“学宫地卑”，迁址到城南门外高地上，并听从堪舆家的建议，改庙学方位朝北。乾隆二十九年，知县认为庙学向北“非礼也”^[20]，将其迁址到嘉靖年间的旧址，确定了右庙左学，面南而建的基本格局。



图11 吴川县城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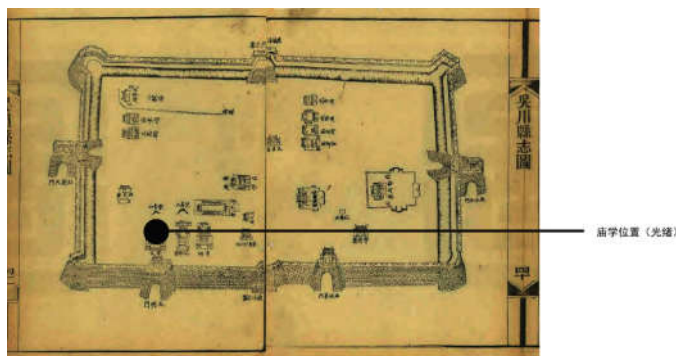


图12 吴川县城图

（四）规避科第不佳、闹市扰学、水患圯学、用地湫隘等问题

庙学的迁址有诸多原因。风水不宜、闹市扰学、水患圯学、科第不佳、用地湫隘、增建无地都是重要的动因。

^⑤资料主要参考：湖南府县志辑，江苏古籍出版社，乾隆、光绪永兴县志。

^⑥资料主要参考：康熙德化县志、民国德化县志。

浙江景宁庙学较为典型的体现了风水和水患的迁址原则。此庙学明景泰年间由潘氏贯道书院改建而成，当时“科第晨星，犹号称得士”。崇祯十年，由于学校培养人才成果不佳，“咎由其地隘陋，且面向弗称，故吉气不踵者”^[21]。崇祯十四年，庙学因“原地湫隘，风水不宜”第一次迁建。知县徐日隆亲自相地，于县北承恩门外五十余步，前临大路，后枕石印山麓，改建新学。《明知县徐日隆迁建儒学记》中记载如下：“学宫之设，以安圣灵，亦以开文运，凡都会郡邑人才隆茂，恒必谣之。余己卯春莅斯邑，初谒宣圣即周视学宫，前后坐山无脉，去水无情，訖之庠师诸生咸云创自景泰三年，分邑时建，邑后从未有腾发者，且庙柱倾斜，堂斋庑废，因叹曰与其修业，不如迁”^[21]（图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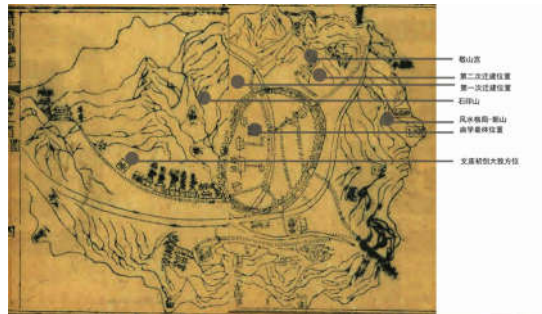


图13 景宁县城图

迁址之后，人才依然寥落。乾隆二十七年，又因庙学风水不好，“学址为县治坐山余气，堂局无情”^[21]，第二次迁建至城东春华门外。这次迁址不太成功，位于地势之低处，常年湿气，木材容易朽坏，正殿、东庑均有坍塌。后只能再次迁建。因科第不佳而迁址的案例还有福建漳州庙学。其于庆历四年创建在州治东南方向，政和二年移到州左。绍兴九年，儒生们认为科举成绩不佳是庙学选址不好造成的，请求还迁回东南方的旧址。福建尤溪县庙学，“乾隆五十八年，知县童檝以科甲关于学宫风水，且殿宇圯坏，复迁”^[22]。

安徽泗县文庙迁址躲避水患的因素较为突出。泗县（原为泗州）庙学元代借用宋代旧址创建。清顺治六年遭水灾学宫部分坍塌，十一年尊经阁火灾焚毁，康熙十一年棂星门又遭雷击坍塌，十八年再次遭水灾。于是，康熙二十二年，在州城外堤岸上重建。康熙二十四年州城水灾，将学宫全部损毁。福建长汀县庙学也是因洪水而迁庙，“成化八年河决浸及文庙，生员踵正等请于御史洪性、提学游明、训道周谟、知府李桓议迁城内，乃规官地市衢所屋基移迁”^[23]。沙县文庙，“（万历十四年）学圯于水，袁令应文迺谋迁之”^[24]；江西萍乡县庙学，“弘治元年水圯，知县江吉迁建西隅沈家窰左”^[25]等。

用地湫隘，增建无地，是庙学建设中较多遇到的情况，一方面是庙学本身的择址之地，比较湫隘，比如太迫近城墙，或者太迫近民居等，使得学校的氛围和规制不展；另一方面是因为，庙学从开始的祭祀用的泮池，庙，大成殿、学，堂，斋，号舍，到最后的名宦祠、乡贤祠、忠义节孝祠、崇圣祠、尊经阁、敬一亭的建设，都是庙学增建所必需的基本要素，因此随着庙学的标准规制的完备，所需要的土地面积也是越来越多的，这时候也会造成庙学土地不太够用，或者即使勉强够，也会显得湫隘。如福建惠安县庙学，南宋淳熙九年，士人诟病庙学湫隘，因此“请于邑令蔡易迁登科山之阳……淳熙十五年，县令成之”^[26]。贵州静宁庙学，明嘉靖时期以“庙当崇，学当肃……陋弗宏，隘弗敞”^[27]迁址。《民国恩平县志》卷之十八艺文中记载康熙五十一年广东恩平庙学迁址的原因，“前令佟君虽复锐意更新，然但仍其旧址，地势卑狭，士气弗舒，欲振其蔽而壮其观……未萃山川之淑气而发玉石之精英，予将卜而迁址……诸生曰邑之东北隅有地爽塏，名镇彦楼者，本吴新之业”^[28]，于是迁建庙学到这个敞阔清幽的地方，见图14。



图14 恩平县城图

三、结语

本文基于大量个案数据分析,通过深入每一个案的相关文献,透析当时的营建者在关于校园选址、迁址方面的真实考量,进而总结出中国古代官学(庙学)选址、迁址是受到风水理论、人才培养效果、经济性、基地建设条件、规避自然灾害等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普遍规律。这种通过自下而上的分析、总结得到的普遍规律,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中国古代官学在城市营建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对于今人真切认识中国古代官学校园选址的考虑因素亦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我们亦能够感受到古人在营建活动之中所透露出的方位观、风水观,以及历史局限性。

参考文献:

- [1]尹弘基,沙露茵.论中国古代风水的起源和发展.自然科学史研究.[J].1989(01):84-89.
- [2]何晓昕.风水探源[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0:1.
- [3]王其亨.风水理论研究[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5,8:5.
- [4]于凤文.(民国三年)灌阳县志[DB/OL].<http://mylib.nlc.cn/web/guest/shuzifangzhi>,2019-8-1.
- [5]赵怡.赵懿.光绪名山县志[DB/OL].<http://mylib.nlc.cn/web/guest/shuzifangzhi>,2019-8-1.
- [6]唐受潘.民国乐山县志[DB/OL].<http://mylib.nlc.cn/web/guest/shuzifangzhi>,2019-8-1.
- [7]庄成修,沈钟,李畴.乾隆安溪县志[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7:477.
- [8]张绍龄.同治昭化县志[DB/OL].<http://mylib.nlc.cn/web/guest/shuzifangzhi>,2019-8-1.
- [9]陈文达.乾隆重修凤山县志[M].台北:大通书局,1984:14.
- [10]王绍沂.民国版本永泰县志[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卷之五学校志22.
- [11]李光祚.乾隆版本长洲县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卷之五学官1.
- [12]佚名.乾隆池州府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卷第十六学校志1-62.
- [13]佚名.乾隆池州府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卷第十六学校志1-62.
- [14]黄桂.太平府志[M].台湾:成文出版社,1974:卷之十九学校1-5.
- [15]丁炳焯.民国大和县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卷之五学校志1-10.
- [16]锡德,石景芬.同治饶州府志[M].台湾:成文出版社,1975:卷之七学校志783.
- [17]顾国诰.光绪富川县志[M].台湾:成文出版社,1967:卷之六学校1-20.
- [18]罗克涵.民国沙县志[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卷之七学校1.
- [19]缪思齐.中国古代城市与建筑方位尊卑观探源及演变[J].城市建筑,2017(03):382-384.
- [20]李繁滋.民国灵川县志[M].台湾:成文出版社,1975:877.
- [21]周杰.同治景宁县志[DB/OL].<http://mylib.nlc.cn/web/guest/shuzifangzhi>,2019-8-1.
- [22]卢兴邦,马传经.民国尤溪县志[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卷之四祠庙42.
- [23]黄恺元.民国长汀县志[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卷之十三学校志4.
- [24]罗克涵.民国沙县志[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卷之七学校5.
- [25]锡荣.同治萍乡县志[M].台湾:成文出版社,1975:卷之四学校学官1-2.
- [26]莫尚简.嘉庆惠安县志[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卷之九学校56.
- [27]王烜.乾隆静宁州志[M].台湾:成文出版社,1970:卷之七《迁学庙记》6.
- [28]佟世男.民国恩平县志[DB/OL].<http://mylib.nlc.cn/web/guest/shuzifangzhi>,2019-8-1.

图片来源:

表1-苗严自绘

图1-王其亨.风水理论研究[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5-8,P27

图2-苗严自绘-底图来自国家数字图书馆《道光灌阳县志》图考卷

图3-苗严自绘-底图来自国家数字图书馆《民国23年灌阳县志》图考卷

图4-国家数字图书馆《光绪名山县志》图考卷

图5-《中国地方志集成·嘉庆乐山县志》图考卷

图6-苗严自绘-底图来自国家数字图书馆《1963年重刊嘉靖安溪县志》图考卷

图7-苗严自绘-底图来自国家数字图书馆《嘉庆池州府志》图考卷

图8-苗严自绘-底图来自《中国地方志集成·乾隆池州府志》图考卷

图9-苗严自绘-底图来自《中国地方志集成·康熙修光緒刊太平府》图考卷

图10-苗严自绘-底图来自《中国地方志集成·光绪永兴县志》图考卷

图11-苗严自绘-底图来自国家数字图书馆《道光吴川县志》图考卷

图12-苗严自绘-底图来自国家数字图书馆《光绪吴川县志》图考卷

图13-苗严自绘-底图来自国家数字图书馆《同治景宁县志》图考卷

图14-苗严自绘-底图来自国家数字图书馆《道光恩平县志》图考卷